

第二节 太平天国战后江南地区文化恢复 与上海石印书业的发端及兴盛

上海元代建县,明代筑城,属松江府,设江海关。开埠之前,偏居海边,经济在江南诸道县中泯然于众,和苏州、杭州等地无法相比,文化地位也不高,今日所谈及的上海古代文化名人,除徐光启之外,如华亭的董其昌、陈子龙,嘉定的钱大昕和所谓的上海县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文化世家少有,文化风气也不浓厚,开埠以前的上海书业经营惨淡,书籍均从苏州贩来,少刊刻梓行,“书店寥寥三四家,如四牌楼、大东门等淞韵堂、文政堂。销者私塾用四书五经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描红簿》,其外则医卜星相等书”^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据道光二十二年(1842)所签署之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县列五大通商口岸之一,翌年正式开埠。跟随着英国人的脚步,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接踵而来;商人、官员、传教士、士兵、水手,形形色色的洋人踏上了黄浦江的岸边。浦江之西异域风格的高楼大厦让国人惊叹,“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然几如海上三仙山,可望而不可即也”^②,但是这些巍峨的建筑和连绵的帆影却并没有提升上海县在江南的文化地位。

当时的江南的书业中心是苏州,“其时书业之盛,以苏州为甲,阊门一带如扫叶山房、绿荫堂等自刻木板批发”^③,西方传教士虽然将近代印刷设备与技术引入了上海,但是参观这些科学设备的中国学人仅仅将其视为“奇技玩好”,没有意识,也没有动力将其用于传统行业升级改造。他们看到了摄影技术,“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一影,眉目毕肖。其法以圆镜极厚者嵌于方匣上,人坐于日光中,将影摄

① 上档:叶九如《书业历史》,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1-177《会办理会员贷款与中央银行、上海市商行的往来文书以及有关贷款问题的会员来函、会议记录、通告,新闻报道等文件》。

② 王韬:《与友人书》,见《弢园尺牍》,光绪六年铅印本,卷一。

③ 上档:叶九如《书业历史》,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1-177《会办理会员贷款与中央银行、上海市商行的往来文书以及有关贷款问题的会员来函、会议记录、通告,新闻报道等文件》。

入圆镜,而另以药制玻璃合上,即成一影。其药有百余种,大约为磺强水之类”^①,却没有想到这种技术可以让印刷制版更易;他们“观印书房中印书车,叹其机轮巧妙”,作诗以记之:“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怔煞老牛浑不解,不耕禾陇种书田”^②,但却不会思考其取代传统雕版的可能性;他们看到了蒸汽机“水沸气涌,行转甚速……轮激行甚疾,有一马之力,织布轧棉,随其所施”^③,却没有想到此其用来牵引印刷机可胜过人力多多。说到底,他们只是一些消费欲望得到满足的书籍购买者,而不是书籍产品的生产者。当时江南地区的传统雕版印刷能够满足这些读者的需求,生产与消费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没有新的需求产生的情况下,技术的升级也就没有了动力。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的话,江南历经明清两代形成的书籍出版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在上海开埠十年之后,这个契机借助于绵延清廷东南半壁的战火终于来临。

◆ 太平天国与上海石印书业兴起的社会背景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自广西金田起事,一路势如破竹,仅两年的时间就从边陲小邑深入中国大陆的腹地。咸丰三年(1853),攻克武汉后,水陆兼程,挥师东下,豪取南京,改名“天京”,虎视江浙,大有投鞭断流、席卷天下之势。清廷震动,八旗、绿营迭相征伐,建江南、江北大营以狙之,后遣汉官兴办地方团练,遂有湘军、淮军之属。至同治三年(1864),天京被淮军攻克,十年间,江南一带战火漫天,文化设施破坏严重,产生了大批的战争难民。战火对于江南来说自然是一种创伤,但是对上海书业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机会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在外,江南藏书被大量破坏。为重建文化及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体现“中体西用”的“中体”,清政府除大量建设官书局,亦鼓励民间书局的出版活动。

太平天国不但在政治和军事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也在文化上严重挑战了清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其所到之处,大肆焚烧篡改儒家典籍,宣

① 王韬:《王韬日记》,方行、汤志钧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页。

② 王韬:《王韬日记》,第47页。

③ 王韬:《王韬日记》,第131、134页。

扬拜上帝教理念,“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属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灭,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①。原来的文化中心和书业中心江南地区惨遭浩劫。梁启超说:“因为文化中心在江、皖、浙,而江、皖、浙糜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凋落。”^②为重建文化,清政府大量建设官书局。叶德辉曾谈道:“湘乡曾文正督师戡乱,不废弦歌。每克一名城,即补秋闱,创书局,礼名士。”^③其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日昌等各地官员都倡导和大力推动官书局的建立。太平天国的焚书毁典打击了上海书业的竞争对手,战后的文化重建则又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官方的政策支持提供了国家层面的宽松环境,于是上海书业腾飞的外部环境已然形成。

在内,太平天国战乱迫使江南各地书局和文化人才进入上海。

太平天国势力的逼近,让江左一代,人心惶惶,富户贫家,竞相奔逃,“举世若狂……一旦闻数百里外之警,公然卷载而逃”^④。那些在上海从事丝茶出口贸易的商人“听到南京、镇江为太平军所占领,就尽力设法向洋商收取账款,甚至愿意取得实物以代替现款。他们拿了现金或实物后就逃跑了”^⑤。作为上海知县的姚辉第借误遭被劾亦“驾一叶舟,飘然而去,不知去向”^⑥。此时,让他们感到最安全距离也最近的地方就是外国殖民者所控制下的上海租界,但是据道光二十五年(1845)11月29日上海道台宫慕久、英国首任领事巴富尔签订的《上海土地章程》“华洋分居”的精神^⑦,中国人是

① 鲍源深:《请购刊经史疏》,见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5页。

③ 叶德辉:《书林清话》,转引自顾承甫:《清末官书局二三事》,《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

④ 《袁祖德告示》,见金毓黻、田余庆等:《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页。

⑤ 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76页。

⑥ 毛祥麟:《三略汇编》,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3页。

⑦ 《上海土地章程》言“界内土地,华人之间,不得租让;亦不得架造房舍租与华商”(第15条),“在洋泾浜以北境内,商人得建一市场,以便华人将日用品运至该地售卖……惟商人不得为私益而设此种市场,亦不得建筑房舍租与华人,或供华人之用”(第16条),由此条款看,虽然没有出现“华洋分居”的字样,但是精神如是。

不能在租界里租赁房屋居住的。然而自大量的江浙难民涌入租界,特别是咸丰三年(1853)12月7日上海道台吴建彰为了向小刀会进攻烧毁了东门外十六铺一带二千多间民房造成大量本地难民后,精明的洋商们发现,这些逃难的中国人为求得暂时的安全丝毫不吝惜钱财,一进入租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块空地可以得到,他们就把它租到手,或者买下来,起造房屋”,以致租界内的地价迅速涨到“难以置信的地步”^①,于是金钱的诱惑让洋商们对这些逃难的人群由拒绝转向了欢迎,咸丰四年(1854)7月5日《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通称1854年《土地章程》)取消了“华洋分居”的规定,默认“华洋杂居”的既成事实,于是大量国人以及规避战乱风险的传统行业由此进入上海。

这些涌入上海的江南人士和传统行业像一条鲶鱼,激活了原本死气沉沉的上海书业。在这种大变革、大洗牌的过程中,新兴出版业的市场需求、人才储备、资金来源都一一成立,只待和传教士带来的石印技术相结合,就会诞生出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灿烂之花。要之,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上海与江南的人口流动为上海石印书业的诞生带来了以下三点好处:

1. 石印本为泰西之法,在国人传统的意识中,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学习。而国人看西方人,又因其不同于己的体貌特征,有意无意地带有一种排斥和偏见。不仅仅不愿学习西方的技术,就算是和西方人见面交往都被认为是“大悖礼教”的事情,必须冒着蒙受“用夷变夏”恶名的风险。19世纪50年代初,李善兰尝自述:

昔年同艾约瑟至杭,乘輿往游天竺,为将军所见。时西人无至杭者,闾阎皆为惊诧。将军特谕仁和知县往询,县令希上意,力逐艾君回沪,而将壬叔发回本州。^②

仅仅是与洋人一同游玩,就会让外人“惊诧”不已以至于用“逐”、“发”

^① 阿礼国:《大君之都》,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3页。

^② 王韬:《王韬日记》,方行、汤志钧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页。在《王韬日记》上文的后面,有以下文字:“壬叔因献诗州守,曰:‘游山不合约波臣,奉遣还乡判牒新。刺史风流公案雅,递回湖上一诗人。’州守见之大喜,立赠以金遣之。”玩味其言,自夸的成分似乎多了些,实际当没有这样的诗意结局,恐怕是州守不敢得罪洋人所致。

这样的行为让他们归去。即使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郭嵩焘奉朝廷钦命,出使欧洲,亦被人视为不光彩之事,同僚、朋友纷纷劝阻,京师更有人赠联讥之: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①

因太平天国战事躲入上海本来是件无奈的事情,但是却让江南的国人有机会和西方人近距离接触,知晓泰西有着自己成熟而发达的文明,高鼻黄发却有着“绅士”的礼节。更加重要的是,西方无形的科技化作黄埔江畔可见的楼宇和帆影,所谓泰西之法是值得重视,并且拿来可用的获利之源。正是有了接触和沟通,文化上的隔膜才会消除。

2. 大量的富有传统学养的中国文人进入上海,形成新的读者群。太平天国战事让大量的江南文人云集上海,蒋敦复,传言他曾参与响应太平天国的上海小刀会起事,值其失败,避祸王韬家中。^② 因其有史才,由王韬介绍进入墨海书馆。管嗣复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被迫从事文书工作。一年之后,伺机逃出,“避难邓尉,艾约瑟至吴遇之,与之谈禅,极相契合”^③,于是把他带到了上海。在王韬的《瀛壖杂志》中,这一类人还有:

何梅屋咏(即何咏,引者注),上元人……金陵既为贼窟,避居吴门……旋刘松岩大令聘之至沪上。

叶调生廷琯(即叶廷琯,引者注),吴县人……吴门沦陷,避地沪上。

冯景亭中允桂芬,字林一(即冯桂芬,引者注),吴县人……避兵至沪。

汪燕山,金陵人……庚申之春,苏垣陷贼,燕山避迹沪上。

① 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页。

② 蒋敦复曾有专门记述这段经历的《草土余生记》,收在王韬的《淞滨琐话》中。虽然言辞中颇有不自愿之意,但正如某些论者所言,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关于自己与太平天国人物交往和上书目的的记载是事后的避祸之词一样,《草土余生记》里的不自愿只能算作一种掩饰。《近代名人小传》言蒋敦复“尝以策干杨秀清,不能用”,又有传言曰此事乃与王韬共谋,但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事史实较清,而关于蒋敦复却没有相关有力的证据,况1862年2月王韬上太平天国书为清军所获,清军指其为通贼,大加逮捕之,而蒋敦复却仅仅避祸为僧就可安然无恙。所以这里不主此论。

③ 王韬:《王韬日记》,方行、汤志钧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页。

左孟辛,名枢,其弟仲敏,名树,湘乡人……乱后挈家避兵沪上。

赵君惠甫……惠甫一字能静,名烈文(即赵烈文,引者注),阳湖人。庚申春间避乱来沪。

张啸山茂才名文虎(即张文虎,引者注),南汇人……乱后避兵来沪。

……^①

此外还有蛟川姚燮、华亭张广文、秀水于源、曲阜孔继镕、海盐黄韵珊、金匱华笛秋^②、兴国万斛泉、上元何咏、孙文川、浦城祝桐君、苏州江湜、杨引传、余姚周白山、任竹君、吴县贝青乔、兴化刘熙载、全椒薛时雨、婺源齐学裘、台湾林谦^③、阳湖周腾虎、吴兴凌霞、云间胡公寿、太仓宋小坡、归安张福禧、仁和龚橙^④、邵阳魏彦^⑤、慈溪舒高第、新阳赵元益^⑥等人。因兵祸和时政变迁避居上海的文人其后亦有,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严复因庚子事变而仓皇至沪,群籍俱散失^⑦;辛亥革命后,陈三立等清遗老至沪长住。这些来沪的文人有的待战事稍靖,时局平稳之后即离开上海,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成为沪上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他们一方面作为读者,增加上海书籍市场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则从传统知识分子转型为近代出版印刷业的从业人员。

3. 传统雕版印刷老字号也进入上海。避难来到上海的国人,其中大部分在兵祸平息之后离沪回乡,但是那些书业局主却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发现了上海存在的商机,同时也带动了其他更多的出版业者会聚于此,“同治甲子,苏城归复。时正上海海舶初通,商业蒸蒸日上,我同业初作避地计者,至是而竟久居焉。自后各省之业我业者,亦贩运来上海。于是上海书业遂独盛”^⑧。这些代表性的商号,除了来自苏州的扫叶山房南北号之外,还有“厥苏州浦氏之绿荫堂亦分设分店文瑞楼来沪,如湖州吴氏之醉六堂、常

① 王韬:《瀛壖杂志》,光绪元年刻本,第四卷至第五卷。

② 华蘅芳父。

③ 王韬继室怀蘅之父。

④ 龚自珍子。

⑤ 魏源侄。

⑥ 王韬:《瀛壖杂志》,光绪元年刻本,第三卷至第四卷。

⑦ 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页。

⑧ 上档:《上海书业公所落成全体大会开会词》,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1-2。

熟鲍氏之挹芳阁、宁波之文玉山房及黄氏之千顷堂。该堂自光绪初年开盘，归宁波鲍氏楼下开设。均随至来沪营业。从前之法租马路，李氏开设还读楼，凌氏开设万选楼，黄氏开设读味楼。邑庙内，卫氏开的翼化堂善书佛经书店”^①。

技术、市场、读者、从业者，一起都已经准备好了，上帝之手已经放在历史巨轮上，等待的就是第一次推动。上海石印书业万事俱备，只需要第一个有眼光的企业家，将在技术上已经完全成熟的石印商业化运营，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历史大幕即将拉开。

有趣的是，在上海最终完成石印书业技术准备的是土山湾印书馆的法国传教士，在上海最早开展石印商业化运营的是《申报》馆的英国商人。

传教士与商人，西方世界东进的最狂热支持者；英国人与法国人，打开中国国门的最早异域来客。

他们，携手开创了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时代。

◆ 点石斋、同文书局和其他晚清石印书局的建立

摄影技术发明于1839年，二十年后由奥司旁(John W. Osborne)成功应用于石印。法国传教士翁寿祺咸丰九年(1859)来华，同治十三年(1874)调至土山湾，为当时上海少数精通照相技术之人，光绪二年(1876)接掌印书馆之后，利用其长，开展照相石印印刷，华人邱子昂为助手。该馆印刷品的内容主要是“江南本省传教之事务，或新闻专为神父们阅者……中西圣学、文学之书”^②，可见其目的是传播宗教而非商业获利。光绪四年(1878)，隶属于《申报》馆系统的点石斋书局成立，曾短期邀请邱子昂为技术指导，看重的就是他既通照相又知石印的本领。《申报》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初七日：

本馆近从外洋购取照印字画新式机器一付于点石斋中。延请明师监印，凡字之波折，画之皴染，皆与原本不爽毫厘。兹先取古今名家法书楹联，用电气照于石上，然后以墨水印入各笺。视之与濡毫染翰者无二。计中国白纸楹联隶书行书或七言或八言者，每付楹联价洋二角，其用外国笺纸者，

^① 上档：叶九如《书业历史》，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3-1。

^② 钟鸣旦等：《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五册），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9—2511页。

亦相同。朱砂笺隶书金字四言对可作新岁门联者,每付价洋一角五分。描金笺琴条,每堂四张,价洋四角。皆装裱齐全,笺纸工整。诸君欲广眼界者,请即向本馆账房或向送申报人购取均可,此布。^①

点石斋初创时主要业务为楹联、碑帖及名画等传统书画作品的翻印,自光绪五年(1879)初石印《鸿雪因缘图记》大卖之后,才开始真正走向了石印书籍出版的道路,并在光绪八年(1882)因《康熙字典》而获利甚巨。姚公鹤说:“闻点石斋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逢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②

点石斋的书籍一方面自售,一方面售与其他书局转卖,如点石斋在光绪八年五月十三日(1882.6.28)《申报》告白称:“本斋所印之多宝船时文现已尽数售与六合堂主人,每部定价若干,现在上海及各外埠,出售处另开在后,此布。”^③数日后,六合堂在光绪八年五月十六日(1882.7.3)《申报》刊登启事称“新印缩本增选多宝船时文出售”^④。

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日(1879.2.28)《申报》发布告白称“可代客排印书籍”,已有可能代客石印书籍^⑤,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880.4.8)《申报》上的“廉价石印家谱杂作等”告白则明确说明代客石印的业务^⑥。醉经堂在光绪八年四月六日(1882.5.22)《申报》发布“照印砖塔铭出售”告白一则:

本坊现有三块本初拓砖塔铭一帖,系用照相机照出,较原本缩小三分之二。此帖外间绝少,定实价五元,惟照印不多,远近诸君如蒙赐顾,请早至维扬辕门桥大街醉经堂书坊面议可也,此布。^⑦

从其文理观之,醉经堂即使是委托点石斋石印《砖塔铭》之后再行贩卖,也至少实现了编辑与发行石印书籍的职能,更何况醉经堂也有引进石印机

① 《申报》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七日(1878年12月30日),13册,第625页。

②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③ 《申报》光绪八年五月十三日(1882年6月28日),20册,第897页。

④ 《申报》光绪八年五月十六日(1882年7月3日),20册,第783页。

⑤ 《申报》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日(1879年2月28日),14册,第181页。

⑥ 《申报》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880年4月8日),16册,第369页。

⑦ 《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六日(1882年5月22日),20册,第676页。

自行印刷的可能。虽然醉经堂有可能不是纯粹的石印书局,但我们至少可以认定其比同文书局更早进入到石印书籍的领域。何况恒泰钟表号在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九日(1882.6.14)《申报》上的“照相并石印书画报名”的告白已表明其已开始石印生产及教学,其词曰:

专照书画并石上印字等法,精工无比。倘有贵商欲做此业,请来面谈可也。兼授照相镀金精法,约期包成。修金格外相宜,代镀大小金银首饰物件。寓四马路中盘记栈对门恒泰钟表号便是。^①

也就是说,国人投资石印出版和石印印刷的时间,都比徐润开设的同文书局要早一些。徐润所著《徐愚斋自叙年谱》述同文书局开设于光绪八年(1882):“光绪八年,从弟秋畦,宏甫集股创办同文书局,余立赞成,并附股焉。”目下详言之:

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上石,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如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版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不下数十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数十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光绪十八年)开办,甲午年(二十年)全集告竣进呈,以此声誉益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停办。^②

同文书局刊登在《申报》上最早一期告白是在光绪九年一月二十八日(1883.3.7)^③,在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83.6.27)刊登“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图轴价目”告白随附小启,完成正式的开业告白。^④徐润是当时著

① 《申报》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九日(1882年6月14日),20册,第814页。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民国十六年版。

③ 《申报》光绪九年一月二十八日(1883年3月7日),22册,第299页。

④ 《申报》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83年6月27日),22册,第945页。

名的买办商人,其在光绪九年时以股票形式在各家近代公司企业中的投资总额已高达白银 120 余万两。^①《民国上海县志》记徐润有关贡献:“以欧西石印法于文化事业裨益颇多,创同文书局,影印《图书集成》,及广百宋斋铅版书局,印刷书籍,艺林诧为创举。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事足与欧美竞争。”按理说,徐润的加入应该给国人一个强烈的示范作用,但是其后的四五年时间里,《申报》上只见有书局转售同文书局的石印书籍,却不见有新的华人石印书局开张,如下表:

表 1.2.1 《申报》所见光绪九年至十二年间各书局分销同文书局书籍情况

时 间	书局名称	告白内容
《申报》光绪九年七月六日 (1883.8.8)	抱芳阁	经售同文书局股票书籍
《申报》光绪十年二月六日 (1884.3.3)	文海堂	复开文海堂书局:去岁已开,书版损毁,今复开,雕版为主,兼售同文石印书。
《申报》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1885.7.30)	长顺晋	石印大题文府经义宏括出售(销售同文书局的书)
《申报》光绪十二年九月十日 (1886.10.7)	抱芳阁	各省分售同文书局石印

资料来源:《申报》,上海:中国书店影印本,1983 年版。

那么,这四五年的沉寂期由何而来呢?笔者认为,在这四五年内,华人资本没有投入到石印书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上游企业,即石印机械设备的制造与销售行业,还没有完成在华经营的准备。最初,石印机械的生产效率较差,也不容易购买,如传教士在上海开展石印时所使用的印刷机是木制石印架和手摇石印机,人力操作,速度极慢。点石斋石印局更以转轮石印机,每机 8 人,分作两班,轮流摇机,一人续纸,二人接纸,虽然效率提高不少,但仍旧是人力操作。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英资麦利洋行引进英“许士耿博”厂制石印书画机器,“可装置煤气火力,一日能印七千余张”,蒸汽动力从此逐步代替人力成了石印的主要能源。该厂石印机亦售予同文等石印

^①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1 页。

局,除印机外,尚有“印书油墨、照相药水”,一切应需之物,皆可随时定寄委托上海外洋泾桥北堍大英医院内麦利洋行在华经销。^① 由于该机先进,麦利洋行“深恐有人仿冒,并杜鱼目混珠,稟请国家颁给凭照,准做五十年期内,如有仿作者,随时控请重罚”,然有上海当地“某铁匠等,兜值仿造,希图乱真”,洋行在“呈请本国领事府照会华官,查禁停制外,特再声明,如有前项情事,定当指名控究罚办”^②。国人除试图仿制石印机械之外,亦曾研制石印墨料,如福州船政学堂肄业之游某,研成机造石印上墨,每磅价洋五元,由泰隆洋行代售。^③ 技术的进步,新动力的应用,较易获得的设备与原材料使得华人能够更加便捷地投资石印书业。由此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扫叶山房、文瑞楼、醉六堂、抱芳阁、文玉山房、千顷堂等传统雕版书局增开石印业务,蜚英馆^④、鸿文书局^⑤、石仓书局^⑥、清华书局^⑦、龙文石印书局^⑧等石印书局相继开设,方才“迨戊子年(1888),石印大盛”^⑨。即如《申报》光绪十三年一月十二日(1887.2.4)《秘探石室》文中所言:

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所印各书,无不钩心斗角,各炫所长,大都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⑩

与雕版印刷相比,石印书籍具有以下特点:

1. 价格低廉。汪家熔说:“雕版书字不能太小,而字大,书就贵。照相石印可以将字缩得很小,书价就便宜,读书人买得起。”^⑪石印的缩印功能很

① 《申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1886年12月29日),29册,第1118页。

② 《申报》光绪十三年三月廿七日(1887年4月20日),30册,第642页。

③ 《申报》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87年10月13日),31册,第664页。

④ 《申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四日(1887年3月28日),30册,第486页。

⑤ 《申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四日(1887年3月28日),30册,第488页。

⑥ 《申报》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八日(1887年8月26日),31册,第350页。

⑦ 《申报》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1887年10月10日),31册,第642页。

⑧ 《申报》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1887年10月20日),31册,第710页。

⑨ 上档:《上海书业公所落成全体大会开会词》,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1-2。

⑩ 《申报》光绪十三年一月十二日(1887年2月4日),30册,第164页。

⑪ 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早就被时人关注,《申报》的编辑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就说石印之文字“细若牛毛,明如犀角”^①。缩印本第一是形制具有新奇感,很多字迹可以缩小到0.1厘米,是前人所未见的;第二是降低成本,售价更廉;第三是精巧可爱,方便携带。除了缩印之外,石印省去了刻工,用机器代替了人力,规模生产降低了成本。

2. 制版容易。传统雕版制版耗时甚多,如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无锡县顾氏“奇字斋”家刻《类笺王右丞诗集》不过五六百页,但“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授钺,至三十五年六月朔完局”^②。前后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但是雕版和活字比起来,也有便于翻印的好处,清末江南制造局聘请了以傅兰雅为首的诸多传教士为其译书,而傅兰雅等人早已掌握铅活字印刷,但是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翻译西书,仍然使用雕版印刷,就是因为雕版便于重印。^③ 石版印刷不需要雕刻木版,也不需要熔铸铅字,只是在照相落石之后需要进行修版。《张元济书札》中就保留了很多他和石印部负责人讨论百衲本《二十四史》修版的信件。但如果是一些责任心不强的书局,把修版一部省去的话,石印的制版就更加迅速了。《益闻录》曾比较石印、铅印、刻本的制版问题:

大抵刻版粗笨,成书不易,而刻工嘉者殊鲜。坊间刻本字迹类多模糊,且一书之版多至叠床架屋。读者,藏版者往往苦之。然有(石)版则可随时刷印,不计多寡,非其利欤? 活版则排印甚速,字迹清明,价值又廉,流传甚广。第不能随时随印,印成一次,版已拆去,未免美中不足。^④

此文成于1890年,铅印的纸型技术还未引进,虽然《申报》馆在1872年印刷报纸的时候就使用泥版技术了,但是泥版毕竟易碎,不易保存。

3. 石印本通过照相落石技术能够保持书法之美。传统刻本大部分字体为宋体或仿宋,边缘转折为平直,这是受雕刻技术限制而成的。书法,特

①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

② 魏隐儒:《古书雕印发展简史》(后改名《中国古籍印刷史》),转引自吴承明、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卷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谷风出版社1987年版,第538页。

③ 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④ 《益闻录》,1890年第1007期。

别是行草书,边缘过渡极为圆润,甚至还有飞白,这些刻本中虽然也能模仿,但是成本就大大增加。石印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保留书法之美,这为书画作品、名人信札的印刷提供了机会。同时,请名人为书籍写的序言也可以直接上版。如1893年同文书局石印的《皇朝五经汇解》^①,俞樾为之隶书序言,归安杨砚为之行楷序言,书法甚佳。

石印在晚清上海风行一时,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石印书局和兼营石印的书局数量极多。张仲民《晚清上海书局名录》^②中载有421家书局,但是一方面,这些书局包括铅印书局和石印书局,不能够反映出晚清石印业的面貌;另一方面,该名录是从刊登于晚清报刊上的售书广告中搜集的,但是有很多小石印书局并没有能力在报刊上刊登广告,他们的宣传方式就如今天的街头小广告一般,甚至是当街售卖。笔者通过整理部分晚清民国石印书籍,从中发现至少有以下39家晚清书局未列入张氏目录中:

宝善书局、宝文书局、宝贞堂、璧园会社、崇善堂、崇实书局、崇义堂、萃文斋、大同书局、富文书局、耕石书局、贯吾斋、华美书局、会文书社、教育世界社、经香阁、乐群图书馆、黎光社、茂记书局、脉望仙馆、南洋官书局、奇书小说馆、三乐堂、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上海石印书局、上海印书工会、尚友山房(属宝山县)、慎记书庄、史学会社、天章书局、文澜书局、文美书局、文谊书局、袖海山房、益吾斋、裕记书庄、支那新书局、珍艺书局。

而实际上所存在的石印书局数量可能更多,当然这些书局中的大部分都是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照相石印法》一文曾计算过民国初年的石印企业投资成本:

落石架上小印刷而言。每日不过印六百张而已。摇架兼打湿布一人,搗墨兼付纸一人。月约工食洋二十余元,殊不合算。但资本甚微,不过二百元已足。若用大架则一日可印三千,用引擎发动则一日可印六千。资本约三千元已足,此等规模较大,自可雇用管车工头。应毋庸述。其不用照相石印者,资本可减一半。^③

^① 《皇朝五经汇解》二百七十卷,题[清]挾经心室主人辑,同文书局1893年版,三十二册。

^②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附录三。

^③ 《家庭知识》1918年第3期,第67页。

二百元不过十倍于两名工人月薪与饭费,可见投资之低。点石斋的老板是英国人,同文书局的老板是广东人,扫叶山房由苏州迁来,而蜚英馆则是江西人的产业。可以说,上海石印业的繁荣一定程度上是吸收了中、外各处资本所致。反之,上海石印业的影响也遍及全国,哪怕是古籍翻印,也因为印刷方式的现代化而代表着新学的传播。

光绪十六年(1890),户部侍郎张荫桓时任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奏准石印《古今图书集成》百部,同文书局承印,于光绪二十年(1894)告成,增入《考证》二十卷,凡五千四十四册,照殿本原式,印刷甚精,与原本无异。考张荫桓《甲午日记》中虽不载《古今图书集成》印成事,及其与徐润之关系,但是光绪十六年之前出使各国的《三洲日记》中常载其翻阅《申报》之事,所以张应该对上海的石印业是有一定了解的。点石斋是外国人的产业,同文书局属于中国人,而张荫桓当时被称为“洋务干才”,与同属洋务一系的徐润就有了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才在光绪十六年刚一回任总理衙门的官职就推荐同文书局以西式石印来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徐愚斋自叙年谱》“光绪八年”条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百部送京,不过《光绪实录》上仅有两条,共三十一部的记录:“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石印图书集成解京。请旨进呈。得旨图书集成十一部。著于本年十二月初三日。由福华门一律交进。由懋勤殿首领太监接收”。与“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谕军机大臣等、刘坤一等奏、石印图书集成。存储尚多。请旨办理等语。著即进呈二十部。派员解京。并赏给每省一部。发交学堂。以资观览。其余解交外务部收存。候旨颁发”。据此推测,很可能清廷在原有基础上又加要了部分《古今图书集成》。同文版石印《古今图书集成》不是全部收藏大内,而是不时作为礼品赠送外国,也作为赏赐之物给各省及新办学堂。《光绪实录》中记载的就有十一次:

- (1)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每省一部。
- (2)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顺天学堂、京师工艺局各一部。
- (3)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五城学堂一部。
- (4) 光绪三十年四月,大学堂等处各一部。
- (5) 光绪三十年十月,实业学堂一部,南洋槟榔屿中华学校一部。
- (6)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京师法律学堂一部。

(7)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高等巡警学堂一部。

(8)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宪政编查馆一部。

(9)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英国某学会一部。

(10)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外务部、储才馆各一部。

(11)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大理院一部。

赏赐的地方既有京城部衙,又有地方各省,还有海外学会。国人既借助于同文版的《古今图书集成》见识到了来自泰西的石印技术,外人也可感受中国典籍之优雅。

上海石印书业兴起的意义:

其一,作为最早形成的近代行业之一,以技术打破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在一开始就有着满足国家需要的强烈功利性目的,所以遵循着枪炮、造船、开矿等重工业优先,纺织、缫丝、面粉等轻工业在后的发展思路,但石印书业却成为一个特例,在沪上商人及买办还在趑趄于进出口贸易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国人投资最早的实业部类。此外,上海的租界俗称为“洋场”。但实际上,其最早的别称不是“洋场”而是“夷场”。这是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反映,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其他的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但是随着中西文明交流的深入,中国人的“天下”观开始动摇,轮船、蒸汽机、高楼大厦这些西方文明的象征物虽然犀利,但是书籍出版更能打动国人的心,这一点广学会看得很明白,“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每一个观察家一踏上他们的国土就会感触到这些特征,并且导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①。

其二,石印书业体现了传统行业的近代转型。上海近代石印书业脱胎于传统雕版书业,扫叶山房、文瑞楼、醉六堂、抱芳阁、文玉山房、千顷堂等书局在开展石印业务之前就已经是名声显赫的雕版印局和书肆,其最初进入石印书业时更像是印刷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而在书籍内容、管理组织方

^① 1887年《同文书会章程、职员名单、发起书和司库报告》,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面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随着社会近代化转型程度的加深,以及一批近代大型出版机构的建立,石印书局也在进行着西学书籍出版、股份制管理等近代化变革。石印书籍生产只是一个契机,当其离开传统书局母体之后,近代化大潮推动着这些书局离着雕版书业越行越远。雕版印刷,“几乎尽归淘汰矣”,在上海则只有“好古之士”还在经营和阅读。^①

其三,促进其上下游行业的形成。作为印刷行业,上海近代石印书业需要纸张、油墨、摄像、印刷机械生产及维修等上游行业以及书籍销售网络等下游行业的支持。传教士石印书籍所需要的设备与原材料全需进口,因为上海没有这些原材料的经销商,所以传教士们只能以私人关系去联系供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石印书业的发展。后来,麦利洋行在沪经销石印机械,方才解决购买设备的问题。虽然国人一开始难以仿制石印机,不过纸张、油墨等原材料较好解决。石印书局选用国产纸张进行印刷,民国初年之后,国产油墨成了进口油墨的重要补充,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瑞昌等华资机械厂也可以修理及仿制一部分的印刷机械,这都体现了石印书局对上游行业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石印书局也在大力铺开销售网络,如同文书局“开设上海虹口,又设新局于二摆渡,专办石印古今书画图帖。另设分局于二马路抛球场,仕商有印件赐顾,请至本局及新局面订。如门市交易,统由抛球场分局发兑”^②。这些书局的发行部门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被称为“书店街”、“报馆街”的四马路,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

其四,传统文人近代转型的一条新路。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中地位最高的文人,在传统社会中唯一被认可的发展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制之中,然而近代社会的巨变,却给了他们一条充满荆棘却越走越宽的新路,那就是随着社会近代化而产生的诸多新兴职业。墨海书馆中“秉笔华士”是他们的第一站,王韬、蒋敦复、李善兰是他们的先行前辈。然而无论墨海书馆或者江南制造总局中的“笔述”人员并不是常设的岗位,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而石印书局由于需要大量具有一定学识素养的抄书

^① 闻野鹤:《上海游览指南》,第3页。

^② 《申报》光绪十三年五月十二日(1887年7月2日),31册,第10页。

校书人员,就给了大批不得志的传统文人以谋生之道,虽然石印书局的校书人、抄书人没有最终发展为近代出版机构的编辑人员,但毕竟为传统文人的近代转型开拓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

上海石印书业发端期即存在的问题:

1. 石印书局受传统印刷业影响,没有清晰的版权意识。在复制古籍方面易形成低水平重复竞争;在出版今籍方面又有着浓厚的“选家”思维,不付稿费,无法以经济利益调动作者积极性,从而提升自己出版物的品质。

2. “述”重于“作”,局主的角色类似于传统的藏书家,考校的是其搜集书的眼光和能力,没有意识到编辑的重要性。所招收的文人不是校书者就是抄书者,唯一和创作有关系的只有并未形成主流的石印画报的画家,如吴友如、张志瀛、周权香等《点石斋画报》画家群。

3. 在点石斋采用照相石印后的几十年内,除了印刷动力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在其他技术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进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民国初年,铅印技术飞速发展,在效率上、产能上远超石印技术,石印书局自然也就退至历史舞台的边缘。

4. 企业组织形式以小企业、小作坊为满足,局限于传统书坊的规模,没有整合行业的要求和动力。即使如同文书局在经营不顺的情况,也只是考虑关停书局,把资金投向铅印业,成立广百宋斋,而并非走向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三节 废科举与民国间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转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之后,上海近代石印书业走出黄金时代。民国时期,上海石印书业可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为民国成立到抗战前的二十五六年的时间,石印书业虽然叠经风浪,但是尚未动摇根基,虽然不能像铅印那样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弄潮儿,然尚可随波逐流;后者为抗战到新中国成立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孤岛时期”上海的石印书局丧失了大部分的内地市场,濒临倒闭,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依然没有好转,行业发展奄奄一息。

◆ “废科举”对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制度叠经变易。西周之前,学在官府,不需要